

《東華漢學》第 18 期；425-42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12 月

【學苑春秋】

緬懷：羅杰瑞教授紀念特稿

羅杰瑞教授（Jerry Lee Norman，1936年7月16日－2012年7月7日），美國漢學家，語言學專家，對於原始漢語、閩方言之研究成果斐然，早年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師從趙元任、Yakov Malkiel和Murray Emeneau，亦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系主任，1998年退休後受東華人社院院長王靖獻（楊牧）教授與中文系創系主任鄭清茂教授的邀請，至東華擔任客座教授一年，教授「語言學概論」與「聲韻學」兩門課，教學極為認真，與東華中文系師生、原住民朋友亦相處愉快。2012年特地邀請他至東華參加第十三屆聲韻學會議，惜因病未能前來，大會仍頒以榮譽會員，表彰他對語言學領域之貢獻。2012年7月7日，羅教授因特發性肺纖維化於西雅圖去世。

羅杰瑞教授及其夫人離開東華之後，依舊和東華的師生保持書信上的往來與聯繫，透過羅夫人陳恩綺女士動人的筆觸，我們更可以了解他們多麼想念在東華客座一年的美好歲月，在此羅列幾段來信分享如下：

「冠宏先生，收到《今我來思》與《東華漢學創刊號》，真是意外的驚喜！如對老友。您和子漢先生去機場接我們到文學院的情景歷歷在目，行李太重了，把瘦瘦的子漢先生壓得腿麻！那晚您細心地給我們一個手電筒，直到現在我們仍在用，我們很懷念東

華，懷念東華的朋友，東華的山和雲，野雉和蟋蟀，還有含羞草和花蓮的水果……」（2003.7.4）

「東華一年我們留下非常美好深刻的印象，杰瑞留起大鬍子，要做世外桃源的居民，我覺得他的長鬍子太難看，他只是笑笑，有一次他去志學路，遇見一個小朋友問他：『現在是春天了，聖誕老公公，你怎麼還在這裡？』……」（2013.9.16）

「鳳凰木、羊蹄莢、含羞草，在其他的校園裡也可見到，但中央山脈的山和雲真是漂亮，『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張養浩），大颱風過後，我們站在學人宿舍門前，數山上的臨時瀑布，假期裡，校園空蕩蕩的，野雉從廢蔗叢中飛起，在停車場上閒踱，請問中外那麼多大學，有幾個校園中能看見瀑布和野雉？……」（2012.3.31）

「東華一年，印象太深了，美好的回憶太多了。有一次聲韻學考試，一個同學胡亂回答幾個問題，卻寫了一首長長的白話詩，說他的無奈，杰瑞只好笑笑，您知道，我對聲韻學，跟那位詩人同學一樣，我必修同師一年的聲韻學，一竅不通，在東華，努力旁聽杰瑞一整年的課，考試居然都及格了，可是對聲韻學一樣是一竅不通，我佩服杰瑞和他的洋朋友、洋弟子，怎麼能大談中國的聲韻和方言，而且愈談愈起勁！對我，那是另類的外國語。……」（2012.9.16）

「看到來函中有『年底』二字，想起我們在東華的寒假，更是多彩多姿，杰瑞喜歡作的工作，談語音、記音，而且杰瑞一直就喜歡少數民族的人和語言」（2013.10.21）

羅夫人這般情深又誠摯的表白，傳達著多年來他們對東華的喜愛與懷念，而東華中文系的師生們，無不珍惜他們與我們共同走過的這段純樸自在的日子。東華漢學編輯部有感於羅教授在國際漢學之語言學領域的成就，及其於東華大學中文系草創之初的貢獻，特別邀請清華大學張光宇教授於2013.10.29（二）15：00—17：00來東華中文系進行一場專

題演講，讓年輕的東華中文人，也能透過張教授深入淺出的講授，了解曾經來此短期任教之羅教授的學術成就。

張光宇教授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語言學博士，亦為漢學界聲韻學、漢語方言學、歷史語言學的專家，他從羅教授與高本漢教授在語言學觀點上的差異入手，精彩生動地勾勒出羅教授不畏學術權威、嘗試以橫的比較另闢蹊徑，勇於為漢語方言學開創新局的努力，張教授並將此內容撰寫成〈羅杰瑞教授與漢語史研究〉一文，經由這一篇擲地有聲之學術論文的引導，我們當更能了解：這一位向來低調、不喜張揚的傑出學者，如何秉持他對語言學的熱情、誠懇求真的治學態度，在方言語言學之國際漢學上所銘刻出來深具影響力的學術身影。

羅教授及羅夫人多次來函表達他們對王靖獻教授連結此事的感謝，王教授與羅教授曾經在華盛頓大學共事，透過王教授從中牽線，使太平洋兩岸之間有此美麗的交會，是以本專刊將從王靖獻教授寫給羅杰瑞教授的一首詩拉開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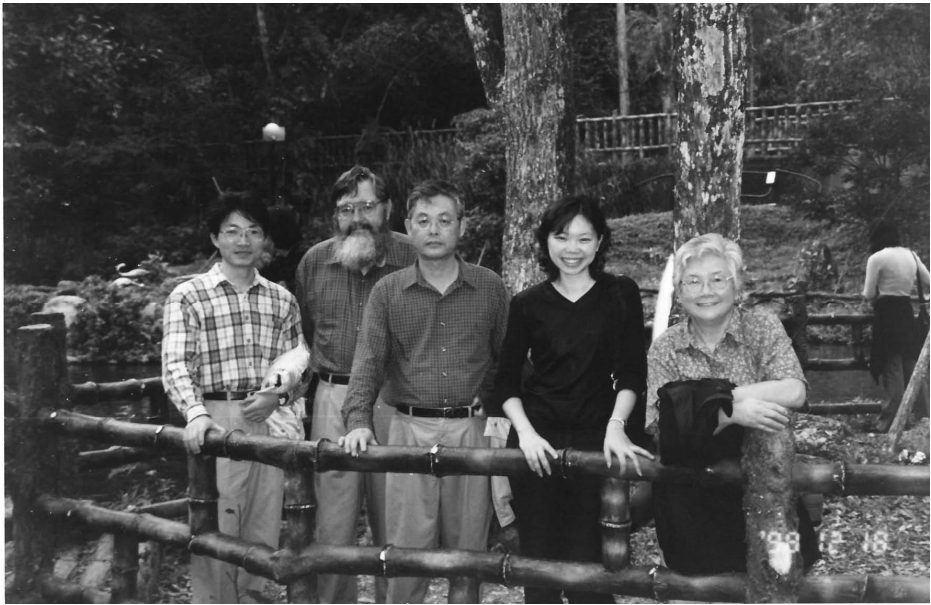
鷓鴣天

無韻體奉聲學家羅杰瑞

木棉花在高溫裏開落，概念留
枝頭，預知一爻如箭將對準不忍的
空白疾行，超越形器，象數，和所有
風雨聲類：虎豹的蹤跡，獨角獸的影
一隻鷓鴣從紅槿小木間狹邪穿刺
迎面看見水影照女牆，遂鼓其短翅低飛
激灑轉平上去入，過河，升高
在前上方，與期待的天色和絃

| 楊牧《長短歌行》

(二〇〇九)



《東華漢學》第 18 期；429-45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12 月

羅杰瑞教授與漢語史研究

張光宇*

【摘要】

作為普林斯頓學派健將的一員，羅杰瑞教授在漢語史研究上留下光榮的足跡：首先是從漢語方言地理類型學透視古漢語與四鄰語言的關係，其次是對瑞典學者高本漢〈關於切韻重建的材料解讀與比較法的運用〉做了全面的檢視，最後是古閩語的重建。他寫的《漢語》專著是西方漢學界的經典，視野高瞻遠矚，文筆細膩周延。

關鍵詞：比較法、漢語語音史、漢語方言學、古閩語、層次概念

*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終結漢語語音史研究的迷思 開展漢語方言學研究的思路

走過亮麗一生的研究生涯，羅杰瑞教授已於去年夏天逝世。如用西方的說法，這趟行程是蒙主恩召（他是虔誠的東正教的信徒）；如用他熟悉的閩南話的說法，他是去看佛祖（他年輕時候曾到臺灣調查閩方言）。蒙主恩召也好，去看佛祖也罷，在中國社會追悼儀式不能沒有輓聯，也似乎應該有個蓋棺論定。上列兩行文字形式上是一幅對聯，但請不要把它視為輓聯，也不要把它視為蓋棺論定，最好採學術史的觀點視為他留下的足跡，英文叫做footprint。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系羅杰瑞教授（Prof. Jerry L. Norman 1936-2012）是西方漢學界繼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之後學養最為深厚，影響力最大的語言學家。如同他當代的學者一樣，研究中國語言學的一個重大課題是研究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但是，突出的是，當一般人沉浸、陶醉在高本漢途徑的時候，羅杰瑞刨根究柢檢視其基本假設，呼籲冷靜、深思，另闢蹊徑。

漢語方言學發軔很早，但中斷多時。羅杰瑞1969年完成博士論文《建陽方言》時，中國正處於狂飆歲月。1979年漢語方言研究重燃生機，蓬勃開展，此時北美只有少數此門專家。如同他當代的學者一樣，方言研究的初步工作是進行「縱的比較」（vertical comparison），掌握古今對應規律。但是，突出的是，當學界沉浸、陶醉在縱的比較的時候，羅杰瑞走出傳統窠臼，嘗試「橫的比較」（horizontal comparison）¹。

羅杰瑞教授的經典著作是198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的《Chinese》（漢語）²。作為西方世界的中國語文通論課本，此書內涵高屋建瓴、博觀約取，文筆則從容優雅、細膩周延。書中許多段落代表他長年研究漢語的結晶，包括深刻的洞察和個人的學說。他在學界異軍突起的標幟是閩方

¹ Vertical comparison, horizontal comparison 這兩個詞語見於羅杰瑞所寫英文序。參看日·秋谷裕幸，《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好文出版，2003）。

² Norman, Jerry L.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言的比較研究，其中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閩方言聲調的發展³（古閩語聲母的重建）和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⁴。

西風東漸以來，漢語史研究兩度受到比較法的洗禮，首度來自北歐，其次來自北美：高本漢運用此法處理滿佈灰塵、頗具神秘色彩的文獻材料；羅杰瑞運用此法剖析孤懸海濱、頗具古樸色彩的漢語方言。兩度比較法的演練在中國都受到高度矚目。但比較法不是機械的方程式，而是啟發思維的邏輯工具，他們如何在中國材料上運用這項工具無疑是漢語史研究的核心課題。如梅耶所說，比較研究是語言史重建的唯一有效工具⁵。底下，我們以羅杰瑞為人物中心，比較法為討論主軸，談漢語史研究裡裡外外的相關課題。

一、語言與語言學

我所知道的語言學家通常也是語言高手，西方如此，東方亦復如此。學界稱譽的名單中，在西方有雅可卜森（Jakobson），在中國有家喻戶曉的林語堂、趙元任⁶。

我很早就知道羅杰瑞掌握多種語言，但不知確實數字。他所就讀的柏克萊加州大學遠東語言系（Oriental Languages, 後改稱East Asian Languages）要求博士生在中英之外讀通日、法、德；求學期間他還隨

³ Norman, Jerry L.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 no 2, pp.222-238.

⁴ Norman, Jerry L.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pp.268-274.

⁵ 岑麒祥，《國外語言學論文選譯》（臺北：語文出版社，1992），頁11。

⁶ 林語堂是中國的第一位語言學博士，他學語言學的地方就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母校——德國萊比錫（Leipzig）大學，兩人前後相距四十年。1935年，林語堂赴美專事文學創作，人們逐漸淡忘，少提他的語言研究，幽默大師成為他的代號。

趙元任是清末留洋的學童，在康奈爾大學取得物理博士學位，後來專治語言學。二十世紀上半，音位音系學在北美成為學界新潮，趙元任是其中的理論大師。

Bosson教授學過蒙古語、滿州話；歐洲的古典語言如希臘、拉丁和梵語據說他也浸淫很久，頗為精熟。他的中文流暢程度近乎一個北京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俄語是他的母語，西班牙語則因童年時期住在加州農村從墨西哥工人的小孩身上習得。⁷即使一個沒有機會親炙的讀者也不難從羅杰瑞作品的字裡行間體會到一股自然流露的、信手拈來的語文涵養，這一點他頗有乃師趙元任的風範。語言學入門教科書說，語言學家未必是會說多種語言的能手（A linguist is not necessarily a polyglot），此話固然不錯。但是，語言學是一種理論，實際的經驗告訴我們：語言永遠比語言學還要豐富；不管是同族系內的方言還是不同族系的語言都可以豐富或強化語言學的瞭解。⁸

古漢語小牛叫「犢」。文字學家可能會說這是形聲字，聲韻學家會說古音作徒谷切。《說文》有之，《廣韻》有之，《史記》亦有之（司馬相如列傳：「相如身自著犢鼻褌」），今日猶見書面（舐犢情深，初生之犢……）。傳統語文學者引經據典，自然的一個結論是中國固有。證據確鑿，孰曰不是？羅杰瑞認為，漢字「犢」的詞源可能來自塞外民族，例如蒙古語tuyul，滿州話tukšan的第一個音節可能就是徒谷切之所本。（Norman 1988, 18）很可能漢語裡還有許多與牲畜、畜牧有關的詞語源自阿爾泰語系。這種說法遠遠超出傳統中國語文學者的視線範圍，只有兼通滿蒙的學者才可能做得到這種詞源學（etymology）的探尋工作。

傳統的漢語史學者不大習慣上述討論方式，他們一般的態度是：古籍有之表示中國固有，意味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即為中土所有。羅杰瑞的上述例子意在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即與周邊民族時相往來，語言上也

⁷ 參看 S. Coblin (2013). *Jerry Norman: Remembering the man & his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JCL, 41. 1. pp.219-245.

⁸ 行文至此，收到最新一期的時代雜誌（TIME, July 29, 2013）其中有篇文章題做〈雙語腦袋的能量〉（*The power of the bilingual brain*），扼要報導了發展心理學的發現。底下摘錄一段：「研究顯示，多語能手具有較好的推理能力，也比較能夠勝任繁雜工作，對衝突的想法也比較能掌握並加以協調。」（Multi-lingual people, studies show, are better at reasoning, at multitasking, at grasping and reconciling conflicting ideas.）

互相交流。漢語吸納周邊民族的語言歷史上無時或已。這種學說是普林斯頓學派的標幟。橋本萬太郎所舉例子包括閩南，讀來更加親近，他說：「也許有人會說，《說文解字》、《方言》等古籍裡有『𨮒』字（*k'a*，腳），有『治』字（*t'ai*，殺），不就統統是漢語詞嗎？我們覺得這不是很好的答案。我們要反問：難道一個字一記載進漢文古籍，就統統都算是漢語詞嗎？」⁹

普林斯頓學派的反思主要是從語言地理類型的差異出發；當一般人們把那種差異歸在「區域特徵」（*areal feature*）的時候，他們不滿足於其描寫、分類的標籤，而試圖以人為本找出背後的理由。這個學說後文還要再談，其背景是對西方歷史語言學的深厚涵養。除此之外，羅杰瑞關於《中國話的文法》是從趙元任的課堂直接學來；音位音系學（*phonemic phonology*）也得到乃師真傳，知之甚詳而不願多談。音系學是一種理論，如趙元任所說，理論分析不是簡單的對或不對，而是好與壞，看分析目的而定。這個說法後來常為西方學者引述。¹⁰底下，我們集中看語音學和比較法，這是漢語史學者的利器。

羅杰瑞對語音學的用心在所著《漢語》第六章隨處可見，這裡僅舉一例。一般語音學教科書描寫舌葉音（*palato-alveolar*，如英語*church*所見）只涉及舌頭與齒齦—上顎的成阻狀態。羅杰瑞（Norman 1988, 140）說，英語的舌葉音即使出現在非圓唇元音的前面習慣上發音的時候都略帶圓唇（*slightly rounded*）。這樣的描寫在入門的、分類的語音學課本一般都略而不談，因為這個唇狀不是主要發音而是次要發音（*secondary articulation*）或伴隨特徵（*accompanying feature*）。這樣的特徵在分類上

⁹ 日·橋本萬太郎，余志鴻譯，《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198。

¹⁰ 例如海曼說：Chao (1934:38) on the other hand, states: “given the sounds of a language, there are usually more than one possible way of reducing them to a system of phonemes, and... these different systems or solutions are not simply correct or incorrect, but may be regarded only as being good or bad for various purposes.”參看 Larry M. Hyman(1975). *Phonology: theory and analys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p.66.

微不足道，但可能在音韻行為（語音變化）上起重大作用。這種細節描寫的意義可分兩方面來說。

A. 整合音系學（integrative phonology）--把語音學分為“分類的語音學”（taxonomic phonetics）和“科學的語音學”（scientific phonetics）兩類。所謂分類的語音學就是以分類為目的的種種設計，包括國際音標的名稱（以主要發音primary articulation著眼進行分類）和區別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如前部anterior，舌冠coronal）。所謂科學的語音學就是實驗語音學，悉以實驗圖譜、數字為根據，其認知基礎是語音充滿無限變數（infinite variable），不是分類語音學所說的那麼簡略概括。

B. 一口原則（one mouth principle）——試圖用同一個尺度對語音進行分析，¹¹跨越元音輔音的傳統藩籬，以便掌握其間的共同性：用來描寫元音的特徵也可施用於輔音。

從這兩方面看，舌葉音的圓唇性狀描寫不是沒有意義的，它的作用在漢語史語言連續性的探討上舉足輕重，後文舉例說明。

比較法初無其名，它是西歐學者從長期工作經驗中體悟、錘鍊、打造出來的工作原則。1862年，隨著施萊赫爾（August Schleicher 1823-1869）「譜系樹」模型（Stammbaum/family tree diagram）的提出，比較法正式在學術史上取得了科學的地位。所謂比較法就是樹形圖所顯示的工作方法：談重建，合枝葉追尋根幹；談發展，從根幹開枝散葉。道理簡單，但在中國，這個科學後來成為神學、玄學。近年來，學界有兩個故事，聞之令人錯愕。A.高本漢說（Karlgren 1954, 211）他一生所做主要是「重建」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李方桂說那不是什麼「重建」，真正重建的地方少之又少。¹²B.北京大學中文系陳保亞說：「有一次汪鋒

¹¹ 這是雅可卜森（Jakobson 1939）提出的分析概念，後來為 Chomsky & Halle (1968) 發揚光大。參看 Stephen R. Anderson (1985). *Phon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 of Chicago Press. pp. 121.

¹² 這個評論來自下列對談：參看《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頁 248。

告訴我，說國外有人認為中國人不懂歷史語言學。」¹³樹形具體而方法抽象，重建科學而途徑神秘，比較法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般的科學只要循序漸進，多做幾次實驗和習題演練，最後一定可以克服困難，掌握肌理。為什麼中國人學了一百年之後，比較法還「逍遙法外」、飄忽不定、難以捉摸？這得從比較法如何引進中國談起。從一開始，比較法就不是以獨立學科姿態走進中國大學的殿堂，它是以附庸身分作為輔助工具為漢語史服務的。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不厭其詳地引介當時西方最為進步的語音學，但是並未闢有專章講述歷史比較法的里程碑，然後就在中國的文獻材料上施展他自己熟習的工具，把研究成果獻給大家。敏銳的東方學者能夠從他的字裡行間意會到方法學要領，但很少能夠具體言傳。零星地談方法散布在林語堂、王力、董同龢等人的作品，高本漢對比較法有評論，但從來沒有負責介紹。¹⁴比較法的理論假設及發展過程沒有以獨立學科方式拿到桌面上討論，多少年後，它仍然以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氣質出現在漢語音韻學教程裡。中國人不懂歷史語言學，此話說得不好。北大英文系主任林語堂深入虎穴（萊比錫大學是當時歷史語言學重鎮），怎能說中國人不懂？識者無幾可能比較公允。

LaPolla: Professor Li, how do you feel about Karlgren's reconstruction...?
（羅仁地：李教授，你覺得高本漢的重建怎樣？）

Li: I think Karlgren even did not feel it was a kind of reconstruction.（李方桂：我認為即使高本漢本人也不會認為那是一種重建。）

※高本漢根據文獻材料把古代的音韻名目“翻譯”成音標符號。從比較法的基本程序來說，他省卻 1.建立對應關係，2.建立音位，就直接進入第三個步驟——賦與音值。參看 Fox, Anthon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¹³ 參看陳保亞，〈懷念徐老師〉，文收於《求索者——徐通鏘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356。

¹⁴ 高本漢評論說：「我個人對於這種方法並不認為滿意，因為它並不能達到我的理想。」文見高本漢著，杜其容譯，《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頁 35

※其實，這是因為方言材料不足以復原文獻的所有區別；現代方言合流太甚，高本漢竟說方法不好使。本末倒置，因噎廢食。

什麼是比較法？高本漢的重建算不算是重建？從操作技術上講，比較重建的方法是在親屬語言的同源詞之間依下列程序進行的：A.兩兩對比、兩兩對比……直到材料窮盡。B.一種對應關係代表一種古音來源（原始音位）。C.後代的不同（對應關係的不同）假設古代有別。這個基本程序，人人信守，高本漢自不例外。

西歐學者進行印歐語比較研究的成績主要是在古典語言（希臘、拉丁、梵文）的文獻材料上取得的，因此有人得出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離開文獻材料，比較法可能捉襟見肘。¹⁵洪尼斯華爾德（Hoenigswald 1991）說：不管是比較法還是內部重建法都不仰賴文獻材料。¹⁶這個當頭棒喝的「警世通言」意在祛除人們的偏見；有文獻材料固然可喜，沒有文獻材料工作照常進行，在方言材料上進行。梅耶甚至認為：「歷代文獻所提供的事實，比起那些從來沒有把它記下來的重大事實，差不多總是不大重要，無關輕重的。」¹⁷我們鋪陳這些西方代表人物的談話主要是為了給後文討論提供一個背景認識。結論說在前頭：漢語史的兩次重大重建工程，高本漢仰賴文獻材料，羅杰瑞悉照方言；高本漢用文獻材料指導比較法如何執行，羅杰瑞用比較法揭示文獻材料的局限。兩位工程師的共同特點：英年完成壯舉。

作為科學方法，比較法實應分初階和進階兩個層次來介紹。初階就是上文所說的基本程序，其態度是「機械地，盲目地」（mechanically, blindly）認真執行，只有這樣才可望識得箇中三昧，也就是把比較法視為「演算法」（algorithm）。有了這個初步認識，在進階的階段我們應把比較法視為「啟發性」（heuristic）的邏輯思維工具¹⁸，所有初階引介的

¹⁵ 近年的討論參看 Lyle Campbell (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MIT Press. pp.367.

¹⁶ 原文作：It should, however, be understood that neith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nor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depend upon written records.參看 Hoenigswald (1991). *I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general or family-specific?* in Baldi(ed.). *Pattern of Change, Change of Pattern*. Mouton de Gruyter. pp.183-191.

¹⁷ 參看岑麒祥，《國外語言學論文選擇》，頁 11。

¹⁸ 參看 Crowley (2010).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62.

基本信條都是幫助思維的指南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真理，包括科學界共同依循的「歐坎的剃刀」(Occam's razor, 從簡原則)在內。¹⁹最後一個重要觀念是比較法的兩重性(dualism): 比較法的執行和成果的解釋(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on the other)²⁰。

西學東來初期，不少知識分子不免犯「方法熱、目的盲」的衝動，把方法奉為萬靈丹(panacea): 我們既然相信並運用這個方法，其結果只好照單全收，雖然我們也知道不盡合理。²¹一般的歷史語言學教科書對比較法只做初階的介紹，因為比較法在其中只有一章的篇幅，從中取經可以得到一些基本概念，以為它就是全豹不免天真。

施萊赫爾用譜系樹來說明比較法。如用梅耶的說法，比較法的目的是用來建立語言的連續性。樹形代表生生不息，連續意同綿延不斷。比較法功在重建，這重建的內涵不只是歷史各階段的「狀態」，還包括各階段間的「連續」。從這個方面看，漢語史研究還有不知多少未知數。高本漢曾經嘗試建立「耳」字的連續發展(前後共八個階段)，只此一回，再無續集。²²從西方的研究過程看，語言連續性的探討才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好有一比，語言重建像起高樓，樓層確立，中無樓梯：下樓得掛降落傘，上樓必搭直昇機。我說這個笑話，背景是梅耶所說「歷代的文獻雖然能提供語言在前後各個時代的狀況，可是我們在文獻上卻找不到語言的連續性²³。」就學科關係而言，歷史語言學家的連續性成果

¹⁹ 參看 Hock (2009). *Language History, 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²⁰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pp.13.

²¹ 參看俞敏所寫前言，文見《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

※在方法熱、目的盲的運動中，一般比較容易忽略的問題是「方法學的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s about methodology)。

²² 例見高本漢著，杜其容譯，《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頁 44。

²³ 參看岑麒祥，《國外語言學論文選譯》，頁 10。

可以成為整合音系學進一步研究的對象。這是三十年來，國際語音學會會長歐哈勒（John Ohala）的工作重點。漢語史研究在這方面不能缺席。

二、漢語語音史

羅杰瑞在趙元任的教導下研讀高本漢，其心得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說是兩代人的智慧結晶，至於批判精神更可以視為師生一脈相傳。1941年，趙元任在音位音系學達到高峰的時候，對高本漢的切韻音系提出理論上的建議；1988年，羅杰瑞在切韻音系基礎的刷新觀點上對高本漢提出基本假設的檢討。歷史學家威爾斯（H.G. Wells）說：「一個人的傳記應該由一個誠實的敵人來寫。」²⁴我認為，要瞭解漢語語音史，首先應讀高本漢；要瞭解高本漢，首先應讀羅杰瑞。趙元任與高本漢年輕時候即有交情（趙元任提議把法文原著翻成中文《中國音韻學研究》時，高本漢還謙沖表示此書不值得翻譯），他的理論上的建議可以說是學問上的友情贊助，但高本漢並不領情，反而怒目相向，語多激憤。羅杰瑞代表誠實的敵人，是後高本漢時代西方的學界明星。底下，我們據《漢語》英文原著的第二章談幾個相關問題，引文附原著頁碼以便讀者檢索。

（一）高本漢是偉大的瑞典漢學家

羅杰瑞用“the great Swedish sinologue”（p.21）指稱高本漢，因為高本漢的研究曠古未有，篇幅則皇皇鉅著，影響則深遠廣被，代表的是一種拓荒、領航、破土、奠基。羅杰瑞說：「到目前為止，所有關於中古漢語的重建及其修訂可以也應該視為單一方法論傳統的產品，源自高本漢及其前輩學者。」（All the reconstructions and revisions of Middle Chinese published up until the present can and should be viewed as products

²⁴ 參看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著，李之義譯，《我的老師高本漢》（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序言。

of a single methodological tradition go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work of Bernhard Karlgren and his predecessors. [p.40]) 因為這樣，漢語語音史研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等於高本漢學。

高本漢的奠基工程是二十世紀同行學者的目光焦點和靈感的泉源。1990年代，英國著名的漢學家A.C. Graham受邀到清華大學來講學（談古漢語代詞），他用高本漢的古音學說談語音關係。我問他對高本漢的看法，他說：「高本漢是我的聖經Bible。」

高本漢獨領風騷、享譽不墜可從幾方面看。首先是高本漢的才具並世莫有，無人與之匹敵。一個人同時具備先進的語音學知識和歷史語言學的背景，又能通讀《詩經》、《尚書》（他為這兩部經典做過註解），這樣的才具在西方傲視群倫，在東方鶴立雞群。早年棋逢敵手的過程中，他遇到法國的馬伯樂（Maspero，又作馬斯貝羅）和中國的林語堂。對前者，他曾正面迎戰；對後者，他不曾回應。

不回應，不回應，一回應就是重砲轟擊。1941年趙元任用音位音系學的理論，加上漢語方言的實例建議高本漢取消兩種合口介音（w:u）的區別，只用其中之一代表就可以了。高本漢顯然被惹毛了，他說這是小兒科「騎竹馬」（ride this hobbyhorse）的「智力競賽」（intellectual sport）²⁵。音系是否要採音位原則分析，見仁見智。喬姆斯基與哈禮取消了phoneme這一層次，²⁶但歐哈勒認為這一略帶抽象的音系單位（重建形式）正是整合音系學的對象。²⁷其實，趙元任的上述建議對高本漢的系統無損，沒有必要如此動氣。這一次重砲轟擊在學界引起寒蟬效應，餘波盪漾終於導致長期盤據不去的「斯德哥爾摩症群」。其結果：中古漢語的形貌很像日耳曼語的書寫系統，日耳曼語史上著名的「伊音變」（i-umlaut）²⁸

²⁵ Karlgren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南天書局 1988 影印，頁 366。

²⁶ Chomsky and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P.11.

²⁷ 參看 Ohala (1993). *The phonetics of sound change*. in Jone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p.237-278 (Longman, London)

²⁸ 參看 Lyle Campbell (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30

也先驗地大量置入其中。高本漢這樣「擇善固執」，久而久之，在學界難免引起誤解，以為從中古到現代未經音系過程（phonological process）即可一步到位，而且方向只是一個。

趙元任從不犯錯（Chao never goes wrong），這是美國語言學界對趙元任的認知。多年來，我對上述重砲轟擊深感迷惑，質問無從。最近，我從馬悅然的文字裡才終於明白其中的緣故。馬同學給高老師的素描說：「他是一位不同尋常的多重性格的人物……他是一位勤奮的學者，會毫不留情地趕跑干擾他學術研究的人。他是——更確切地說似乎是——一位冷酷無情的君子，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一點兒都不管別人；但同時他極富同情心，願意幫助一切遇到困難的人。」²⁹馬悅然（Malmqvist）曾任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年輕時在高本漢門下讀書，他對老師如此坦率描寫，無異公開學界秘辛。我在美國唸書時期，有一次，張琨老師突然冒出一句話說：「趙先生，李先生太怕外國人。」看了馬同學的生動素描，我終於明白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威力。

表面上看，這些插曲似乎無關宏旨，但在學術史上關係重大。西方的歷史語言學發展像一場接力賽，³⁰相形之下，漢語語音史研究更像原地踏步（march in place）。如果要瞭解為什麼，得從上舉故事細細尋繹。簡單說，像趙元任這樣的天才，高本漢都不假辭色，其他人豈不聞風喪膽。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讓學界像中邪一樣只能在狹窄的空間裡「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玩音標符號遊戲，使這門學問越走越窄，終於掉進羅杰瑞所說的「死胡同」（dead end）。

斯德哥爾摩是高本漢祖國瑞典的首都。學界亦步亦趨模仿、抄襲高本漢，允宜稱作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他說過做過的會說會做且一再重複，沒說沒做的不說不做且不越雷池一步。寒蟬效應如此，多少與重砲轟擊事件有關；趙元任後來少談語音多談文法更難謂全無干係。

²⁹ 參看馬悅然著，李之義譯，《我的老師高本漢》，前言。

³⁰ 參看徐通鏞，《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二) 高本漢的途徑

誠實的敵人終於怒吼。羅杰瑞用“Karlgren’s approach”指稱高本漢中古漢語重建工程的基本假設。他說：

高本漢研究這門學問的途徑已跑完了全程；再繼續那麼追探下去，只不過是在舊材料上要耍花樣，不可能對歷史過程提出什麼新的看法。如果中國的歷史語言學要從故弄玄虛的泥淖裡挽回，最要緊的工作是澈底檢討方法學的基本假設。

(It indeed seems that Karlgren’s approach to this topic has pretty much run its course; pursued further, it can only lead to an unending process of juggling and re-juggling of the same old elements, without really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f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 to be rescued from scholasticism, a thoroughgoing re-evaluation is essential. — p.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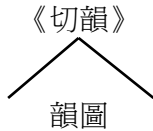
他的書在英國出版，好有一比：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透過英國廣播公司（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對外放送，它的聲音可以穿越千山萬水，無遠弗屆。正常的耳朵多少會好奇想知道其中的內涵。

高本漢的途徑指的是高本漢研究中古音的三把鑰匙：韻圖，域外方言，現代漢語方言。這個排列次序代表高本漢倚重的深淺：韻圖最重要，域外比域內方言還有價值。（Karlgren 1954, 215-216）羅杰瑞的解讀和評論發人深省，底下撮要引述。（p. 41）

- A. 高本漢的中古漢語重建在本質上是對韻圖音類的重建；切韻是一個基本資料，韻圖是這個基本資料的解釋，所據是時代稍晚，地域有別的方言；沒有人強迫我們非接受這個解釋不可。
- B. 漢語方言自古傳下，不絕如縷。域外方音傳播在異域難免受當地語音系統的調整與變造。現代漢語方言的價值遠遠大於「古代方言」的域外方音。

韻書和韻圖在高本漢的假設裡視如一體（他說差別甚微），羅杰瑞認為不然。我們用圖形來表示兩種看法的差異：

高本漢的途徑



羅杰瑞的途徑



在高本漢的途徑裡，方言（含域外對音）只是韻圖的附庸，合則取不合則棄；羅杰瑞認為那是一偏之見。

域外方言的價值凌駕在漢語方言之上，這是高本漢的核心信念。早年，馬伯樂曾建議高本漢把遇合一寫做-u（如北京：布pu，都tu，姑ku），高本漢說不行，因為越南漢字音讀-o。因此，他仍然用他的「折衷主義」採取-uo的寫法。從音變的角度看，各類聲母之後的韻母都相同，表示不變（至於「模」mu~mo的變化起於唇音的鼻音原則：使元音降低）。³¹馬伯樂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羅杰瑞的美國之音在中國並非沒有知音。1983年，也就是在《切韻音系》出版後的三十年，李榮從長期蟄伏中浮出檯面，發表談話，一鳴驚人。他說：「對傳統的一些音韻名目，我們得明白它是在什麼音韻基礎上提出來的，我們要恰如其分地瞭解，恰如其分地使用。否則你多讀一本書，你的脖子就多套上一根繩子，繩子多了，就寸步難行。」³²如果，羅杰瑞途徑還略帶抽象，李榮的洞察應該洞若觀火，足以振聾發聵；韻、等（含開合）、攝代表三個層次，不要混為一談。高本漢把韻書韻圖視為一體，其結果是把三個層次壓縮成為近乎一個層次。

歷史語言學家金恩說：「就語言學而言，一個重建完成的詞遠不如重建它的方法有價值。」（Linguistically speaking, a reconstructed word is

³¹ 這是漢語語音變化的原則之一，詳見作者未刊稿《歷史語言學》。

³² 李榮，〈關於方言研究的幾點意見〉，《方言》第一期（1983），頁1-15。

far less valuable than our method of reconstructing it.)³³這個「方法」包括假設和程序 (the assumptions and procedures that advance us toward that reconstruction)。從這個角度看，羅杰瑞在漢語語音史研究上是負責的、盡職的。

1921年，林語堂從德國回到中國任北大英文系主任，開始著文介紹高本漢的學說，並費力撰寫上古時期方言問題的學術論文，填補了高本漢學的一大片空白。1935年，林語堂轉赴紐約從事文學創作，他在漢語史上的業績反被文學作品所掩蓋，精闢的見解也少有人提及。試舉二例³⁴。

A. 周秦九百年之久，中國幾千里之遙，豈能有齊齊整整永不改易的呼音？（《語言學論叢》，頁152）

B. 高本漢有不可諱言的成就，可惜他也犯了這種疏忽的錯誤，把切韻廣韻的反切視為長安的方音，而不明白：切韻是匯通古今南北方音，預備做一本南北人皆可用的字書，所以分韻唯恐不詳，所列並非任何一地之音。（《重刊語言學論叢序》）

其中B可取周祖謨（1966）所寫〈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合而並觀，羅杰瑞談《切韻》也是這個觀點，且不細說。

A是1923年在《國學季刊》發表的看法，對清儒而言這是嚴厲的責難，對高本漢而言這是「同質假設」的挑戰。一石二鳥，值得細細品味。底下分同質假設與內部重建兩點討論。

同質假設 清儒的「大一統」思想，用歷史語言學的話來說，就是同質假設。他們原來以《詩經》押韻為研究對象進行韻部分合，以其字少，後來又把《說文》諧聲字納入，擴大涵蓋範圍。……最後終於把周秦九百年，東西數千里的語言現象視為一體，同質的語音系統。歷史語言學的同質

³³ Robert D. King (1969).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Grammar*. Prentice-Hall, INC. pp.155.

³⁴ 林語堂《語言學論叢》原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1933），晚年赴臺定居，作者把原書交由臺北文星書店重刊（1967）。

假設是指史前 (prehistory) 的原始語言 (proto-language)，不是文獻反映的歷史 (history) 時期。

內部重建 沒有比較材料可用，單純從一個語言系統內部的交替形式 (alternation) 去嘗試重建更早一個階段的方法，這是現代語言學開山祖師索緒爾的發明。這樣重建出來的結果叫「前語言」(pre-language)。例如，從切韻系統內部出發，看音系格局的空格或交替形式推測的較早狀態叫「前切韻」(pre-Qieyun)。

漢語史研究並非按上述歷史語言學的標準作業程序進行：有史時期的上古階段被目為史前的共同語階段，前切韻被上古階段掉包。這一切作為都表明，比較法、內部重建法只是一個幌子，串連文獻才是目的。換言之，二十世紀的漢語史研究是用新的名稱來為舊的觀念服務。李榮很早就把上古音研究看作「鬼畫符」的特殊行業，我用「雕刻藝術」比喻其工作內涵。

王力晚年把畢生研究成果集結為《漢語語音史》。這部皇皇巨冊，分為上下兩卷，卷上羅列歷代音系，卷下敘述語音的發展規律。³⁵ 底下談其中一個觀點，一個重要發現。

A. 《切韻》在中古音沒有位置 王力的歷代音系有一個「隋—中唐」(531-836) 的階段，這個階段一般學界擺的是陸法言《切韻》，王力以陸德明《經典釋文》和玄應《一切經音義》取而代之。因為，《切韻》不是一時一地之音。他對《切韻》的解讀與時人沒有什麼不同，都依周祖謨³⁶，然而取徑顛覆傳統，別開生面。

B. 資思是晚唐五代的新興韻部³⁷ 所謂資思韻就是舌尖元音 (apical vowel)。王力的這一發現在語言的連續性上特具意義。前人談漢

³⁵ 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³⁶ 周祖謨，〈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收於《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³⁷ 參看王力，《漢語語音史》，頁 287。

語史的舌尖元音化多從《中原音韻》的支思韻談起，王力給同類的發展找到文獻上最早的源頭：資思 > 資師 > 支思 > 知思。其中，宋代的「資師韻」是我給的名稱³⁸，文獻上的反映是「支魚通押」；為求名稱一致，我把清初《李氏音鑿》的第七韻改稱「知思韻」。

漢語語音史可分上下兩段來說：中古以下和中古以上。中古以下可以進行比較科學的、理性的探討；中古以上可以隨假設的不同進行各種推測。它們的抽象層級是不同班的；羅杰瑞說，假如中古音是一級抽象，上古的抽象層級更高。

上文，我們曾用接力賽比喻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發展過程。漢語史上，這樣的接力賽得從高本漢的未竟之業說起。羅杰瑞致力最深的閩語就是其一，這是下文的重點；王力在《漢語語音史》所談語音的發展規律是其二。如何尋求語音的發展規律，王力做了簡單概括，主要是古今對應。底下是語言連續性探討上值得注意的幾個方面：

- A. 現在是瞭解過去的鑰匙；共同性是瞭解現在與過去的鑰匙。這是國際語音學界近年矚目的焦點。
- B. 分類的語音學不同於科學的語音學。這是尋求語音解釋首應注意的分野。
- C. 音系學是理論，其最大價值在幫助人們掌握規律。但規律只是描寫、分類，不能視同解釋。
- D. 比較法分為初階和進階；初階是基本假設和操作技術，進階代表靈通思維和高瞻遠矚。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說不知高本漢學有已竟和未竟之分，「已竟」之內說不出其途徑，從而原地踏步或進行「堆砌式」的勞作。羅杰瑞用「高本漢的陰魂」(Karlsgren's ghost)來指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思想盲點³⁹，尤其是在漢語方言發展史觀。

³⁸ 詳細的討論參看作者，〈語言的連續性〉，《漢藏語學報》第五期（2012）。

³⁹ 參看 S. Coblin (2013). Jerry Norman: *Remembering the man & his perspectives*

三、漢語方言學

高本漢在漢語史研究上的另一個結晶是方言關係。他說，所有現代漢語方言都從《切韻》脫胎而來，只有閩方言不然。(Karlgren 1954: They all (except the Min dialects) derive from the Ts'ie-yun language. [p.216]) 從施萊赫爾的譜系樹看，語言關係與語言重建相生相伴；就高本漢來說，上述結晶只是他執行比較法的「副產品」。要瞭解什麼是普林斯頓學派的戰略目標，首先得從高本漢這個結晶進行深入探討。羅杰瑞走進閩語世界應從這句話得到啟發，他在漢語方言發展史觀上則與橋本萬太郎同在一個傘下。

《切韻》是現代方言的共同母語。這個命題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感到不可思議。如上文所述，王力以其非一時一地之音把《切韻》從「隋中唐」這個歷史階段移除；徐通鏘雖然不那麼極端，但也認為高本漢這項命題「把複雜的語言現象簡單化了。」⁴⁰《切韻》不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做成的調查報告，它是古今南北韻書的彙編，大一統思想觀念下的產物；《切韻》根據的那些地方韻書（各有土風）才是以實際語言為基礎的作品。現代漢語方言沒有一個不像《切韻》，也沒有一個方言全像《切韻》（悉照所給反切發音）；一般方言如此，閩方言也不例外。現代方言的較早源頭應是那些各有土風的、地方韻書代表的方言。

on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⁴⁰ 徐通鏘，〈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歷史比較研究〉，收於《徐通鏘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15。這個觀點的最早源頭是羅常培。

(一) 漢語方言發展史觀

漢語語音史主要是談漢字音的發展過程，上面所說方言關係也以此立論。普林斯頓學派不以此為限，比較貼近語言。底下是羅杰瑞的兩個論點：

A. 漢語原來分布的範圍比現在狹小得多，其中心在黃河平原。但從周代開始漢語已擴散到周邊地區，後來甚而至於征服並同化了周邊的少數民族，這種態勢歷久不衰，其結果即今日所見。
(p.4)

B. 如果僅從歷史時期的發展情況斷定漢語從不受周邊語言的影響，那是不對的。周代以前，中國的文化優勢也許不像後代那麼強大，漢語難免吸納外來成分，模規也許還不小。(p.16)

征服、同化這一路思維在高本漢學當道的時代，很少有人提及。這個學說的淵源有中國的，東洋的，在歷史語言學上則得加上西洋的因素。

1980年代，我有一天在柏克萊加大圖書館的書庫裡找書，借來一本徐松石神甫所寫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前面一位借閱的人簽名正是橋本萬太郎，我喜出望外，由此斷定：橋本學說形成的源起之一是這部1933年的著作。

東洋的源泉是服部四郎（1955）。他說，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都是從同一拉丁語分化變異而形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法蘭西人或西班牙人的祖先，從太古就說的是拉丁語。因此，現代法語或西班牙語所有的詞，並非都來自拉丁語，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繼承了他們祖先說過的非拉丁語。（橋本萬太郎《語言地理類型學》中譯，頁199）

在西洋，像拉丁語的這種擴張運動及其所受土著語言的“修飾”（modification）就是底層理論（substratum theory）的張本：法語至今

仍有300個早期高盧語的底層詞，但說拉丁語的u在法語變為y係受底層語的影響卻難獲得普遍認同。⁴¹

總結言之，漢語方言發展史像拉丁語擴張運動。據橋本的說法，東亞是農耕社會，只要有一小塊耕地人民生活就能自給自足，這種生活方式決定了百姓安土重遷。各地原來就有各種各樣的語言，隨著漢化的進程，逐漸放棄「先有語言」，祖先說過的語言多少仍有留存。

代表個人學說特色的是羅杰瑞所提「古南方漢語」(Old Southern Chinese)的假設。(p.210)例如古吳語就可能是古南方漢語的一類，時代約當東漢、三國與西晉。這個假設把問題引向深入，從歷史故事看來，那是完全可能的。

(二) 古閩語重建

從譜系樹的分枝看，閩方言在高本漢的心目中地位有如日耳曼語系的哥特語(Gothic)，拉丁語系的古典拉丁語(Classical Latin)。到底閩語具有什麼神秘、古老的性質自然成為後高本漢時期的研究重心。1973年，羅杰瑞在閩語比較研究上發表了他初試啼聲的作品，引起學界廣大迴響，餘波盪漾至今仍未消停。這篇文章〈閩語聲調的發展〉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是：這是比較法在漢語方言內部的處女航，前途未卜；何處是暗礁，只有上路才能知曉。底下只看一例。

例字	福州	廈門	建陽	邵武	古閩語	切韻
爬	p2	p2	p2	ph2	*b	*b
皮	Ph2	ph2	ph2	ph7	*bh	*b
瓶	p2	p2	v9	ph2	*-b	*b

羅杰瑞心中的問題有兩個：一、為什麼《切韻》的一個並母(*b)在閩方言之間會有如上分歧，同屬平聲字但清化之後有送氣的也有不

⁴¹ 參看 Lehmann (1973).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pp.174.

送氣的。二、為什麼在建陽方言裡，除了上述現象之外，還多出一類，聲母讀v而調歸第九調（不是常見的陽平調2）。因此，他把材料排列如上，試從古閩語的三個聲母（普通的*b，送氣的*bh，軟化的*-b）重建去解釋。

首先應該強調，這是一次嚴格的比較法的演練：聲母上有三種對應關係（p/ p/ p/ ph，ph/ ph/ ph/ ph，p/ p/ v/ ph），聲調上也有三種對應關係（2/2/2/2，2/2/2/7，2/2/9/2）。依比較法基本程序（標準作業）進行，允宜為每一種對應關係建立一個古音來源，其結果就是如表中所列的古閩語聲母。在這個基礎上，羅杰瑞宣稱：《切韻》的重建形式不足以解釋閩語聲調的發展。這項宣示引起學界騷動。

其實，在羅杰瑞之前，董同龢早已注意到了高本漢所說「閩語例外」的問題。1960年，董同龢在《四個閩南方言》談到：「凡是留心漢語音韻學的人都覺得，在有些方面閩南話實在有超越切韻系統的現象……。那麼就這一點，我們是不是可以想：中古的濁塞音聲母可能有送氣和不送氣兩個來源呢？」（頁1016）這一提問顯示董同龢是瞭解比較法的，因為在他之前沒有人發出類似的聲音。不管是兩個來源還是三個來源，都是比較法演練下的產品，只不過董同龢態度保守而羅杰瑞激進；董同龢處在疑似之間，羅杰瑞則篤定如此。

羅杰瑞把切韻形式列在表中以供參考，這個舉措表明他知道傳統的學者可能會怎麼討論這個問題。羅杰瑞會得出三個來源，那是比較法入門守則要求的，這個守則叫「規律性假設」（regularity hypothesis）：同樣的條件下只能進行同樣的變化，不可以有忽東忽西的情況。他要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同一個並母在平聲字裡會分歧如上？他選擇的答案是：只有假設古代原就不同。

比較法分為初階與進階。兩重性就是進階的內涵，一般歷史語言學教科書多半輕輕帶過。上文所說的，不管是兩個來源還是三個來源，都是嚴格執行比較法的結果，也就是初階生產線上的產品，如何解釋已非比較法所能為力，時常得從非語言因素去探討。

語言發展可分為正常傳承 (normal transmission) 和異常傳承 (abnormal transmission) 兩種情況。規律性假設是在正常傳承底下提出的工作原則，一般人類語言的發展都屬正常傳承，父傳子，子傳孫一脈相傳。像皮金 (pidgin) 和克里歐 (creole) 那種狀況屬於異常傳承。這是美國語言學家湯莫森和柯夫曼所做的分野。⁴² 歷史語言學裡又有另一種分野叫「直接繼承」和「間接繼承」 (direct inheritance vs. indirect inheritance) ⁴³，後者通常是指從親屬語言借詞進來。異常傳承指的是不同族系語言的混合，間接繼承是指同族系內部的借詞 (非同族系的語言之間也有借貸現象，但不叫間接繼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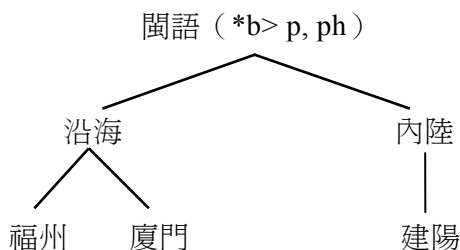
從學術史的眼光看，自高本漢之後，比較法在中國的演練沉寂了五六十年。羅杰瑞的處女航有兩個意義：其一是對高本漢的回應，把「例外」的面貌如實呈現；其二是對高本漢途徑的否定，悉依「比較」結果重建，不依文獻。學界有人以「於古無據」批評羅杰瑞，這是對比較法的汙蔑。但是，羅杰瑞過早地宣稱切韻不足以解釋閩語也未免衝昏過頭。從「兩重性」來看，正確的說法是：閩語的比較研究顯示，同一部位的濁塞音有三種對應關係，我們可以暫時用三個音位代表其間的不同；用傳統的話來說，切韻的同一個聲母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閩語分兩讀或三讀，何以如此是另一個問題。換言之，羅杰瑞和董同龢一樣，其比較法的執行屬於「盲目、機械」的初階，如何解釋這初階的成果屬於進階的層次。

並母平聲如依規律性假設有三種可能的發展： $*b > p$ ， $*b > ph$ ， $*b > b$ ，這三種叫演變類型。如依正常傳承、直接繼承，任一方言只能有其中之一；如果一個方言兼有其中兩個或三個，那可能意味著其中之一或二係經由異常傳承或間接繼承而來。

⁴² 參看 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Relationship*. UC Berkeley Press.

⁴³ 參看 Crowley (2010).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從樹形圖上看，上表的四個方言可以分為兩組或三組。邵武的並母全都作ph，與眾不同，應單獨處理，視為另類。明·王世懋《閩部疏》謂：「建邵之人帶豫音。」此中所謂「邵」就是邵武，豫音代表江西腔（豫即豫章，今南昌）。福州、廈門都有*b> p, *b> ph兩個規律，建陽則在這個共同點外另加*b> b~v（吳語）。用樹形圖表示，這三個方言的關係如下：



什麼是閩語？我們可以根據上列並母例字所顯示的狀況概括：古全濁聲母不分平仄清化後含送氣和不送氣兩類的方言。羅杰瑞（Norman 1988, 229）嘗試用「定母12字」加以界定（如廈門：糖、杏_{th}，銅、豆t），從規律性假設來看，定義是精密了（只限定母），但通性（含古全濁塞音、塞擦音在內的共同傾向）被犧牲了。沿海和內陸的閩語同出一源，後來的發展隨地而異；建陽的第九調只是閩西北發生的間接繼承，與沿海方言無涉，不能視為原始（共同）閩語的一部分。進一步的探討與閩方言的形成有關，事涉漢語語音史和移民史：前者是邏輯，後者是歷史過程。

（三）時代層次分析

1979年，羅杰瑞發表的〈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文章簡短，影響深遠。下表是一個簡單的概括：

廈門	石	蓆	詞例
漢代	tsioʔ ₃	Ts'ioʔ ₃	石頭；蓆子
南朝	siaʔ ₃	siaʔ ₃	石硯；筵蓆
晚唐	sik ₃	sik ₃	(文讀)

這兩個例字都是《切韻》的昔韻，石字禪母(*ʒ)，蓆字邪母(*ʒ)。閩南話的三讀代表三個不同的時代來源，南朝那一層近乎《切韻》的*jäk，而前後又各有一個層次。最早的那個層次可能是漢代移民帶進來的，第二個層次是南朝後期移民帶來的，第三個層次是晚唐文讀推廣的結果。

年代早晚在歷史語言學裡分做兩類：歷史過程(chronological process)和邏輯過程(logical process)。歷史過程說的是事件發生(例如引進)的年代次序，邏輯過程說的是事物發展的內部肌理。羅杰瑞的英文題目叫chronological strata，指的是歷史過程，也就是根據歷史事件(移民)把三個「詞彙－語音」引進的時間次序連繫起來。他沒有談昔韻這兩個字音的邏輯過程，因為漢代的情況並不清楚。如果歷史過程和邏輯過程是一致的，那麼可能這兩個字的韻母是具有後元音的，也就是「閩語例外」的內涵之一。

我們在上文談古閩語重建的時候看到，原始閩語的古濁塞音有兩類(建陽的第三類不在其中)，一類送氣，一類不送氣。「石、蓆」兩字的最早層次在聲母上也反映這種情況(禪讀同船，邪讀同從)：dz~dz > ts, ts'。羅杰瑞依韻母形式，把閩語的層次分做三層，但是在同一個韻母(漢代)層次上，聲母並不相同。如果文讀是間接繼承，白讀是直接繼承，為什麼後者在送氣不送氣上不一致？如果漢代的層次是直接繼承，南朝和晚唐的層次應屬間接繼承。

比較法的一個工作原則是原始語言的同質性，其中不能有方言分歧。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古閩語重建裡有如許「怪音」(*b之外有*bh, *-b)，因為這樣才能一對一的發展下來，而不是方言混雜的結果；同樣的道理，只有假設ioʔ與iaʔ是隨不同的移民帶進來的，才不會破壞同質

假設。但是，這樣仍然不能解釋為什麼在同層（ioʔ）裡，一個濁的阻塞音（dz~dz合流）會有送不送氣的差別。

比較法的最後結果是樹形的語言連續性，層次關係盡在其中。漢語方言文白異讀層次問題猶方興未艾地在進行熱烈探討，足見漢語語音史（字音史）的工程遠遠沒有完成。羅杰瑞說漢代的音韻問題仍不清楚（poorly known to us），其實如從語言的連續性看，中古以下還有許多空檔有待填補——這是高本漢期待後人繼踵增華的未竟之業。

羅杰瑞認為閩方言的文讀在漢語史上應歸晚唐，也就是歸功於五代十國（907-960）的閩國王審知。我們從漢語字音發展的軌跡看，閩語文讀應是南宋偏安江左大力推廣北宋中原雅音的結果。止攝開口三等在隋—中唐時讀愛歐塔（iotacism，前高元音化），晚唐時期其中的精組字開始舌尖元音化（資思韻），宋代舌尖元音從精組擴散到莊組（資師韻），元代又擴散到章組（支思韻），明清時期連同知組字也已完成舌尖元音化（知思韻）；範圍日益擴大，進程井然有序。這個語言的連續性（邏輯過程）不但有時代的烙印、文獻材料的反映，還有方言地理學的深刻痕跡。資師韻（止開三精莊組讀舌尖元音）的文獻材料見於宋代時期閩方言詩文押韻中的「支魚通押」⁴⁴（舌尖元音讀為y, u, u），現代漢語方言集中見於閩粵，偶或見於江西（粵語以y, u或ei, vi形式出現）。南宋偏安江左152年（1127-1279），其文教推廣的能力涵蓋數省；閩王號令只在福建境內，前後也不過數十年，如何連同江西和廣東也有資師韻的明確跡象？漢語語音史沒有語言連續性，方言層次看不清楚，時代層次更加撲朔迷離。

高本漢的漢語發展模式把漢語方言分為來自《切韻》和閩語例外兩類。閩語和《切韻》到底有沒有關係？閩南方言上述的南朝層次與《切韻》的重建形式最為貼近，如依高本漢的說法這層應從《切韻》而來；羅杰瑞認為這一層次與《切韻》的基礎方言相同，也就是《切韻》與閩

⁴⁴ 參看劉曉南，〈宋代福建詩人用韻所反映的10世紀到13世紀的閩方言若干特點〉，收於《漢語歷史方言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83。

語共同承繼前《切韻》時期一派方言的讀法。這一層前《切韻》的讀法仍廣見於客贛方言，其共同特點是前低元音。如果說客贛方言來自《切韻》，那麼閩語也來自《切韻》，這一受韻書蒙蔽的說法殊為荒謬，更貼近的說法應是：《切韻》與這些方言共同承自六朝方音。

六朝方音概可分為中原東西兩支，偏東的保守，偏西的創新。從移民史上看，凡出自中原西部（洛陽以西）的移民都有一個共同的方言特色：古全濁（voiced obstruents）讀為清送氣。這一特色在南方見於江蘇通泰（南通—泰州一帶）和江西（客家方言在內）。其時代在西晉衰落（317AD），移民南下把這一創新形式帶到足跡所至。這一創新現象不是切韻能透露的，而是移民史的共同指向。比較法的結果常得靠非語言因素（extralinguistic factors）去進一步討論。如果古閩語的**bh*之類有地理背景，中原西部是其最終的可能來源，「蓆」字的*ts'*可以視為同一地理類型的規律變化（**z*~**dz*>*ts'*）。

四、結語

漢語史研究經緯萬端，但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只有兩人曾經認真執行過比較法，一個是北歐的高本漢，一個是北美的羅杰瑞。作為誠實的敵人，羅杰瑞對高本漢的批評是中肯的，他在閩語研究上的努力也予人無限啟發。從比較法看，漢語史研究還有兩塊廣闊的天地，一個是語言的連續性，一個是整合音系學。

語言的連續性 這是高本漢在總結一生研究所做的明確宣示。他說他完成的工作是上古和中古兩個歷史階段，從上古到中古、從中古到現代，力有未逮。我們以樓層做比喻，高樓已經完工，中間沒有樓梯：在高本漢學範圍內看，上古到中古的“發展”五彩繽紛，天花亂墜；中古到現代的「發展」線條分明，一步到位。一個過繁，一個過簡，這就是高本漢留下的未竟之業。他曾演練示範的例子是：「耳」*ni*>*nzi*>*zi*>*zi*>*zi*>*zi*>

ʒ > əʒ > əɹ⁴⁵。這是他寄望後人的大業，但無多少迴響；閩南話的hī不在其中，更要求解釋。

整合音系學 這是實驗語音學家拓展版圖的工作企圖，謂之為強化比較法。歷史語言學家根據實證材料進行重建，取得一個概估的代數值，語音學家據以實驗看其中的合理性給予補強。這種工作在西方行之有年，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漢語史上，這種工作有待開展。

「霜」jɕaŋ > ɕuaŋ的古今對應，前人覺得殊不可解；王力（早年）和董同龢把它歸在少數變異而不說是例外，⁴⁶大約因為從高本漢引進的「伊音變」看，其韻母變化應作jaŋ > iaŋ。其實，這個少數變異問題的產生是起於試圖從「一步到位」求其結果；如果改從語言連續的觀點去追蹤，問題迎刃而解：ʃioŋ > ʃyoŋ > ɕuoŋ > ɕuaŋ⁴⁷。這四階段的變化不是少數變異，而是泰半中國反映的共同趨勢：最早一個階段見於浙南，第二階段見於長江沿岸，第三階段見於中原外圍（偏西、偏北），最後一個階段見於中原核心（河南、河北、山東）。從整合音系學的角度看，ʃioŋ > ʃyoŋ是因為介音在圓唇成分的包夾下變圓唇：圓－展i－圓 > 圓－圓y－圓。這是宕開三莊組字的規律變化，不能以例外視之；這是泰半中國的共同趨勢，不能以少數變異涵蓋。

學術是生生不息的智慧活動，漢語史的鉅大工程絕不是一兩人甚或一兩代人的努力可以竟其全功。一個勤於耕耘的學者只會留下光榮的足跡，引領後人繼續前進。羅杰瑞是西方繼高本漢之後的巨擘，他的《漢語》在未來數十年仍將帶給西方、東方讀者源源不斷的靈感泉源：生命也許很短，身影可以很長；前修如有未密，後出必定轉精。

⁴⁵ 高本漢的這個連續發展，趙元任曾經引述過，參看他的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北京今音以前應有一個階段聲母讀為捲舌，先是擦音後變流音。

⁴⁶ 參看王力，《漢語語音史》，頁 653、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廣文書局，1970）。頁 220。

⁴⁷ 參看作者，〈語言的連續性〉。值得注意的是：舌葉音與介音j 在發音上不相容，同時低後元音ɑ在後元音中最不圓唇。因此我把jɕaŋ 改為ʃioŋ。

Professor Jerry L. Norman and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Kuang-Yu Chang*

When Prof. Norman passed away last summer, at 76, he must have worn an avuncular, affable smile on his face like he always did while sharing his views with young scholars, mind at peace with mission accomplished. His smile can be deceptive when it comes to the core issu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On this one-year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as I reflect on his path, two of his conspicuous views come to the fore: one o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the other on Chinese dialectology.

He is a Gladiator in his tenacious, Herculean attempt to put an end to the myth surrounding Karlgren. The myth is a mix of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written records and the resulting unorthodox exercise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o that end, it takes not just courage it also takes profound master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His maverickism has yet to win wide and loud applause, but it struck a chord with me long before his monumental Chinese appeared. He is lonely but not alone--the czar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Beijing, Li Rong, can be viewed as his ally.

He is a trailblaz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His academic debut, titled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was and still is a sensation in the circle. While everyone else indulged himself in vertical comparison, he had opened a new horizon doing, fittingly, horizontal comparison, producing a “bizarre picture” about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It was a work out of the *modus operandi*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ut proved unsuited for the taste of the general audience. He came under fire, but he felt undaunted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because his colleagues were not as skilled in the techniques (basic procedure) and the so-called “dualism” about that discipline. Like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Karlgren before him, he has now become the center of gravity. Criticism of him may be easy but, to be fair, amid the gun-smokes he has inspired many in the field: we can do it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more fruitful and academically more significant.

In his stellar research career, Norman has left splendid footprints. He is a terminator of a long tradi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he is also a bellwethe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With his genius and relentless pursuit, he has made far more contributions than can be depicted in a concise paper. For many years to come, my assessment is, his great book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cons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it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decades' whole-hearted devotion. The Chinese like to say, open the book, peruse it, and you are sure to benefit. If you are to grasp the essential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you have got to spend some time munching, chewing and digesting this cornucopia, the best introductory survey of its kind.

Keyword: Princeton School,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